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第 10 卷

第 1 期

（总第 34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与学生发展的关联性

----实证研究发现了什么？

朱红 李雪凝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100871）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071002）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近年来大学生发展方面的实证研究和数据，从学生参与度的视角，总结了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与学生发展的关联性。分析发现：高校学生工作与学生发展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生态互动性、多层次、多路径、适度性等特征，并且具有条件性和结构性的差异。研究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界要反思“二元”培养体制；重新认识高校学生工作的角色定位，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高校学生工作系统；重视学生参与度的理论视角在高校学生工作评估中的应用；关注学生基层组织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学生工作，学生发展，人才培养质量，本科教育

How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actually impact students: Wha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out?

Abstract: Based on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by a research team of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d how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have actually impacted their students.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mainly show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effect of student affairs on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This complexity was reflected by its systematic and ecological influence on student growth, with multilevel and multipath impact, as well as limited marginal rates. This paper suggested China needs to reflect on its “dualist” college environments; to strategically redesign its student affairs through a new mission of promoting student learning; to adopt the theory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student affairs; to diversify student organizations.

Keywords: Student Affairs, Student Development,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llege Quality

作者简介：朱红（1972-），女，陕西三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学生发展等研究。李雪凝，（1985-）女，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修思想政治教育。 联系邮件：hongzhu@pku.edu.cn
项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80172）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下文简称学生工作)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学生工作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新形式下,正在逐步从“重管理”走向关注“学生服务”、“学生发展”的范式。在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学生工作与学生成长发展的关系,是设计、评估、改进学生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关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与学生成长的影响关系,国外学者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尤其是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比较发达的北美。有学者估计大学生在校期间 70%的学习成果来源于课堂以外的经历。课外活动参与能够为学生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参与程度高的学生不仅能够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自信心、发展目标、成熟的人际关系等指标得分也较高。^[1]

必须承认,目前学生工作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研究主题还不属于主流研究范围,经费支持有限等原因,学者们对这类研究关注不够。学生工作的实践者虽有兴趣,但多数研究是实践者自身的工作经验总结;或者是“工具化”的研究,即如何在学生工作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2];或者是应然性的论述分析,即基于体制目标,学生工作对学生发展应该有哪些影响作用^[3]。这些研究大多数都不是基于实证数据的分析和总结。

随着社会各界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学生工作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课外活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学生对课外社团活动的评价被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的组成部分,课外活动参与情况被看作学生就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外活动参与对学生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的证明。^[4]但是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扩招之后,高校文体社团活动的开展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一定是显著的、正向的。^[5]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从 2006 年开始,开展“首都高校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的年度调查(以下简称年度调查),调查采取学生自评问卷方式,收集首都高校第一课堂教学,学生工作开展状况,以及学生成长等方面的数据。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本文将主要基于这些年度数据和相关论文,分析下列问题:学生工作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如何?实证数据是如何说明、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关系具有哪些特征?以此总结我国学生工作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以及存在问题。

二、重要概念

本文涉及三个重要概念。第一,高校学生工作。高校学生工作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党政共管体制,形成了两大共同运作的系统:思想教育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思想教育系统形成了由团委、学生会为主体的第二课堂发展体系;行政管理系统由学生资助、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部门组成了学生发展的辅助支持体系。学生工作对学生成长主要是通过这两个体系共同发挥作用。这两个发展体系,与教学系统形成的第一课堂发展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高校学生发展的整体系统。

第二,“学生发展”的概念。“学生发展”(Student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源于西方高等教育。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美国高等教育界逐渐意识到:如果学生事务管理仅仅投入到学生服务的事务中,学生的前途将变得异常模糊和渺茫。于是学生事务管理者们的角色由以往权威的纪律管理者、服务提供者转向学生教育的合作者,学生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模式逐渐形成。“学生发展”被定义为“人的发展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它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能掌握越来越复杂的发展任务,达到自我实现和自身的独立”。^[6]本文将学生发展定义为学生的学习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学习性发展包括专业素质、认知思维、和创新能力三方面的发展;社会性发展包括道德情感、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的发展。

第三,“学生参与度”(Student Engagement)的概念。学生参与度是指学生在课堂内外、有效教育活动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大学所创造的促进学生参与这些教育活动的服务和条件。学生参与度对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术界将学生参与度视为院校评估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生参与度积极影响学生成长的关系已经被学术界多次证明过。^[7]尽管各个研究的具体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实证研究支持一个基本结论:只有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才有可能在不同维度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8]

由于学生参与度旨在探究大学教育的过程,因此该概念能够帮助大学更好地认识学生有效学习发生的过程和机制,从而促进大学做出相应的改进,比如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促进学生在课堂内外教育活动中投入时间和精力。^[9]综上,学生参与度是分析学生工作政策、资源配置、队伍建设是否产生成效的关键点,借助这个概念,可以打开因(学生工作)与果(学生发展)之间的黑箱。

三、 首都高校的实证研究

(一) 学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力^[10]

朱红使用2010年年度调查数据,将学生参与度视为一个全面的概念,涵盖了课堂学习,课外学习,跨专业学习,和课余活动等不同方面。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学生参与度与学生成长之间的直接、间接和总的关系;还通过不同群组之间恒等性分析,比较了不同类型院校之间影响机制的差异性。

研究验证了西方的学生参与度理论在中国高校中的适用性,数据表明:在中国高校中,学生参与度同样是影响学生成长的关键因素;并且,这一结论在不同类型的院系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在课堂学习、课外活动等方面的参与程度越高,对自我成长发展的主观评价就会越高。课堂内外积极的参与会促进学生在知识积累、认知思维、组织表达、道德价值等不同维度的发展。

(二) 学生参与度的影响机制^[11]

西方学者构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大学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力。在这些模型中,大学生的就学经验或学生参与度是影响学生成长的关键因素,而学生与教师、管理人员和同辈的互动关系,又是影响学生参与度的重要因素。这些互动和学生参与度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各个方面的成长和发展。参考西方理论,朱红的上述研究还分析了中国高校学生参与度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在首都高校中,通过加强学生与教师、辅导员、同辈之间的交往互动,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参与度会得到积极地提升。研究发现:与辅导员的互动会直接促进学生不同维度的成长,尤其是在高职高专院校中辅导员的影响力较为显著,而“985”,“211”和一般本科院校中辅导员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另外,辅导员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和激励工作,提高学生在专业学习方面的投入程度。

数据还表明不同类型的院校中,三种互动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在一般本科

院校中,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对提升自身参与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高职高专院校中,辅导员的作用则明显提高;同辈互动的趋势是随着院校精英性质的减弱而变小,在研究型大学中同辈之间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其影响程度相对最小。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院校中,与教师“课堂知识传授”之外的交往对学生的成长没有显著的作用。

(三) 不同类型参与度对学生成长发展的影响力

当学生参与度的理论和操作化研究越来越成熟时,学者们开始建议将学生参与度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来研究。学生参与度可以从行为和情感的维度划分,也可以从学业参与和社会化参与的维度划分。在美国,很多研究使用了NSSE(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和CSEQ(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的数据来研究学生在学习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参与度。还有学者使用情感和社会因素来预测大学生的学业成功,那些在情感和社会行为方面更为健康的学生似乎有更高的几率在大学里获得成功。在高等教育界对学生参与度的多维关注中,西方学者再次确认了学生发展的整体性的哲学:大学的人才培养成果是“相互依赖的,学习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而不是相互分割的。在多种环境中运行的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着学生的学习(p.669)。”^[12]

朱红和阿诺德采用2008年年度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学生参与度(学习行为,学习情感,课余活动和社会情感)对学生成长发展之间的直接、间接影响^[13]。模型拟合良好,表明可以依据理论框架解释实际数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课余活动参与度是影响首都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余影响因素依次是学习情感参与度,学习行为参与度,和社会情感参与度。课余活动和学习情感参与度会积极地、显著地影响学生在课堂和课外的学习行为。第二,学术情感参与度对学生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较小,但是通过影响学生在课堂学习、课外活动的参与,学术情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的间接影响力比较大。第三,不同维度的参与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习情感参与度是影响女性发展成长的最重要因素,对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课余活动参与度是影响男性学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对女性的影响力相对较小。男性学生的社会情感参与度对他们成长发展的影响力会大于女性学生。

(四) 课余活动的适度性^[14]

孙纳睿和丁小浩指出西方学者认为学生参与投入可能存在“适度”问题;参与不同类型的课外活动可能在不同情况下对学生认知发展、自信心、人际关系、道德水平等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她们利用2010年年度调查数据,分析了课余活动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适度性。研究首先发现,课堂以外存在着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学生自学投入和课外活动参与存在适度区间,并且投入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力边际递减;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作用降低,达到一定程度后,增加的参与投入反而引起全面发展水平的降低。适度区间的存在表明,课外自学和课外活动并非越多越好,学生需要参与更加丰富的活动以获得全面发展,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学会规划各类活动参与的广度和频率。

第二,课外自学、课外活动参与、积极课堂参与对不同维度学生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自学时间投入在一定区间内对学生认知能力、当代社会意识和身心健康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学生事务处理与人际关系发展水平影响则显著为负;而积极课堂参与指数对学生当代社会意识发展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 课外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存在院校类型差异。比如, 课外自学在一定区间内对各类本科院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当代社会意识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为正, 对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却无显著影响; 在一定区间内对“985”院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影响显著为正, 对其他类型院校学生无显著影响。

(五) 学生工作与学生学习

1. 与学生学习特征的关系^[15]

鲍威根据学生对所在高校教育的满意度, 以及学生对未来就业发展前景展望将首都高校学生分为四类。高度匹配型学生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明确规划, 发展取向与大学教学定位一致, 具有较高的大学教育满意度; 独立型虽有较为明确的发展规划, 但大学教育满意度较低; 被动顺应型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和发展规划, 但因未理解大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大学教育满意度较高; 排斥型对个人未来发展没有明确展望, 对大学教育的顺应度和满足度也相对较低。该研究发现, 高校课堂外教学服务, 课程设置的体系性和实践应用性三个方面的质量若达到较高的标准, 则会降低学生成为排斥型、局部匹配型和被动顺应型的概率。因此, 课堂外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将有效推动学生进入有效的教育活动中, 提升他们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度, 最终增加高度匹配型学生的比例。

2. 与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16]

朱红、文东茅等假设师生关系是高校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发展状态不仅与大学的教学环境息息相关, 也受到学生工作系统的影响。研究采用2010年年度调查数据, 将高校不同层次的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全面考察了教学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对师生交流的影响机制。研究数据表明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的确受到高校不同层次环境因素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作用, 包括学生工作系统的影响。第一, 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影响其学习交流的最主要因素, 会正向地、极大地影响到学生和老师的课堂内、外的学习交流。第二, 多数院校中, 学生工作对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没有直接影响作用; 但是通过对师生情感交流的促进作用, 学生工作间接地对师生学习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 对学生工作的满意度与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密切相关: 对学生工作满意度越高的学生, 和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也会越多。

(六) 辅导员工作的影响力

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以下简称辅导员)是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组织保障。朱红利用2009年年度调查数据, 分析了深度辅导工作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力^[17]。数据显示, 在各类院校中, 深度辅导能够在自信心、学习动力、和生活目标清晰度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地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学业成绩相对落后、学习参与程度较低的学生与辅导员进行深度交流的可能性会更大, 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深度辅导工作超越了传统的思想政治道德工作范围, 开始关注学生的学习。但是整体上, 深度辅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微弱, 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中; 并且, 各类高校的深度辅导对象主要集中在学生骨干当中, 针对普通学生、女性学生的深度交流不足。

许丽媛利用2010年年度数据, 分析了深度辅导工作对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作用。^[18]首先, 首都高校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最大压力源为就业压力, 其次为学习压力、情绪压力、家庭经济压力及人际压力; 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在院校类型、性别、家庭经济背景方面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异。其次, 高校的硬件环境与人文环境、辅导员与学生交流的次数、大学生对辅导员工作的满意度均与大学生的心理压力都存在显著负相关, 会有效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

第三, 辅导员与学生良好的沟通交流可以调节高校硬件环境的不足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影响; 但是无法调节高校人文环境的不足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不良影响。

(七) 关联性的院校类型差异^[19]

西方学者的院校行动模型指出院校承诺和院校期望共同塑造了学生所处的高校组织环境, 并形成了院校期望环境, 不同院校通过提供不同的期望环境直接影响学生能力发展方向。其次, 不同类型院校通过课程教学和课外活动来影响学生的学习性和社会性参与, 从而间接促进学生的能力发展。杨钊和许申采用 2010 年年度调查数据, 分析了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力是否存在差异。

调查发现, 本科学生消极学习参与的得分高于专科学生, 积极学习参与的得分低于专科学生, 社会活动参与的得分低于专科学生, 集体活动参与的得分高于专科学生。研究认为: 第一, 普通本科院校本科学生和高职高专院校专科学生对能力的自我评价有所不同, 高职高专学生在职业和心理素质方面显著高于本科生, 本科学生在公民素质方面显著地高于专科学生。第二, 积极学习参与、消极学习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和集体活动参与对个人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 高职高专院校通过影响学习和社会参与, 对学生个人的公民素质与职业和心理素质产生了间接的正向影响。

另外, 本文所列举的其他实证研究均发现不同类型院校的学生工作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了各个高校学生工作职能的裂变、管理实践的特色、以及矛盾和冲突。

(八) 不同高校学生参与度特征的聚类分析^[20]

在扩招之后学生工作不断创新的形势下, 对目前学生工作的整体特征进行研究很有意义。从学生参与度的视角, 朱红和文东茅分析了“首都高校学生工作的整体特征是什么?”、“不同高校之间在学生参与方面存在哪些异同?”等问题。该研究采用 2010 年年度调查数据, 以涉及学生工作内容的学生参与度为指标, 对首都 80 所高校进行了主成分聚类分析。研究发现, 根据大学生的参与程度, 首都高校可以分为六类, 每种类别的高校在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的学业支持、辅助支持体系、思想政治关注程度、参与实习和班级活动等方面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分类的结果与传统的、根据“大学的研究性”进行分类的结果具有一定关系, 但是不完全一致。这说明首都各高校的学生工作不仅受到大学的研究性的影响, 也与自身的专业特色、精神传统等特征结合的更为紧密, 呈现出更为丰富、更为多元化的特色。

研究认为, 重视学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学生工作的日益认同的目标和理念, 学生工作正在从传统的管理职能向学生服务和学生发展的职能拓展。然而在管理实践中学生工作的服务和发展职能相对落后, 尚待形成完善、配套的管理措施, 比如多数高校提供的学业支持和辅助支持相对落后,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学生的参与度普遍不足。

四、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分析上述实证研究的结论,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学生工作与学生成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多层次、多路径、具有条件性和适度性的影响关系。要科学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必须收集大量的、长期的、追踪的、多角度的实证数据, 通过不同的分析方法, 才能对二者关系进行比较科学的勾勒。本文仅尝试从上述时间、区域、样本、数据类型等比较有限的实证研究中总结二者关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生态互动性的特征。这种关联性首先受到基本文化理念、社会价值观、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塑造,受到社会政治体制,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制约,并且和个体高校整体氛围、学术风气、组织制度、资源配置、学生群体等微观因素相关。比如在原本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下,以班级为单位的微观环境是学生参与大学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形式,班级和支部活动会相当大地影响到学生的发展。但是实行学分制、小班教学、淡化专业、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之后,学生基层组织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原有的班级界限淡化,多元的学生学习、交往群体出现,因此班级相对应的活动也不断弱化。这一系列变化必然会导致学生工作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发生变化。这种系统性、整体性还体现在学生整体参与程度越高,对成长发展的自我评价就会越高。课堂内外全面、积极的学习生活参与度会促进学生在知识积累、认知思维、组织表达、道德价值等不同维度的发展。

第二,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多路径的特征。实证研究数据显示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途径,学生工作的各种因素影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一方面,学生工作通过政策制度、管理部门、正式学生组织等形式,对学生发展具有自觉的、直接的、明确的组织性和控制性的导向。同时,通过开展课余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支持引导学生组织的发展等形式,学生工作形成了对学生成长发展的潜移默化的间接的影响。

第三,二者之间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发展,受到不同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比如数据显示:自学时间投入对学生认知能力、当代社会意识和身心健康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学生事务处理与人际关系发展水平影响则显著为负。

第四,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条件性差异。同样的政策制度、管理实践对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学习动机和学习特征的学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学生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会全面吸收大学内外部因素对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学生个体内部会被进一步整合,继而体现在他/她的大学参与度上。这个影响过程和影响程度会由于学生上述个体条件的差异而产生区别。

第五,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差异的特征。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年级、专业、院校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多数实证研究显示高校学生工作对学生成长发展的影响路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院校类型差异。比如,本科学生和高职高专院校专科学生对能力的自我评价有所不同^[21],本科和高职院校的学生课外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22]其他实证研究还显示共青团、学生组织的活动,具有学生参与面窄,参与群体的精英化倾向以及低年级化的特点。^[23]

第六,学生工作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作用具有适度性的特征。研究数据显示,学生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存在适度区间,并且投入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边际递减。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作用降低,达到一定程度后,增加的参与投入反而引起全面发展水平的降低。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下列政策建议。首先,反思“二元”培养模式,创造一体化的培养环境。实证研究显示了学生工作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数据也表明了总体上学生工作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程度仍然较小,其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结构性的差异,学生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活动方面的参与程度不甚理想。

20世纪后期,为了摆脱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困境,应对大学提出的“把高等教育的

重点放在学习上”，美国大学学生事务管理重新审视了自身的任务和目的，将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力图打破“学术事务”与“学生事务”的界限，共同营造无缝隙学习环境(seaml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我国高校体制由于历史因素和社会政治体制原因，学生的学业教育与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一直是“二元”分离的体制，形成了“教书不育人，育人不教书”的特殊形式。政府、高校需要审慎地思考传统的、割裂式的“二元”培养环境对学生成长的影响，逐步打破现有的文化和制度隔阂，加强高校中教学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的协调合作，建立全方位、系统的、目标一致的学习生活指导体系，努力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创造一体化、协调的培养环境。

借鉴国际经验，学生工作要特别注意到：目前课堂之外的学习指导对我国高校学生来说远远不足。学生工作要充分了解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基础教育进行对接，与高校教学部门密切合作，增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服务功能，创造学习机会，共同合作开展学习辅导，比如开设“学习方法与技巧”、“专业文献阅读”等学习辅导类课程；提供“适应学习环境”、“培养学习动机”等咨询服务；关注其他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不同场景，如学生宿舍，实习等；促进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结合，加强第二课堂对第一课堂的巩固、补充和延伸作用；加强学生与教师、学工辅导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加强辅导员在学生学习方面作用；提供更为完善的学习资源；建设关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预警机制(early warning)和援助机制(referral systems)。

再次，重视学生个人努力——学生参与度的评估。学生是高等教育生产过程中具有主动性的联合生产者，他们的自身努力和参与投入是获得各方面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要重视学生在学习、科研、课余活动的参与程度。重视学生参与度的研究，从中分析学生工作资源投入、政策制度、管理实践的效率 and 效益。大学的质量评价、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改进要以促进学生在课堂内外、学习和生活的参与程度为主要目标和工具。

另外，关注班集体建设，同时认识到学生基层组织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教学系统的宏观改革，如加强“通识教育”、实施“学分制”、“选修制”等措施，必然会导致学生工作微观环境的改变。班集体、支部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是影响学生的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但是未来的学生基层组织的发展必然是多中心化的趋势。学生工作要改变思路，寻找正在出现的学生基层组织新的模式，比如学生社团，学习团体，学生宿舍等，创造新机制，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来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学生工作应该倡导多元化发展模式，区别对待各类非正式组织，对非正式组织的合理需求给予必要支持，改变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外部环境^[24]，引导和推动非正式组织围绕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开展活动；在大学生自主探索新知识的需求基础上，有效整合正式的学生组织与非正式的学生组织^[25]，以便真正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同时，构建扁平化的学生工作运行模式，完善学生发展的辅助支持体系。学生工作要完善学生资助、课外活动、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源和服务，减轻学生在经济、就业、和心理方面的学习后顾之忧，确保学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有意义的教育活动中。这就对学生工作的运行机制提出新的要求：构建扁平化的学生工作运行机制，减少管理层级，各职能部门直接面向学生，提高信息交流，及时回应学生需求。^[26]

最后，用“适度”的思想指导课外参与投入。实证结果显示，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参与都具有一定的适度性，并非愈多愈好。利用适度的思想，在实践工作中指导学生不断优化时间分配方式，有利于学生取得更适宜个体状况的最优发展。适度的原则同时也再次说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性”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 [1][4][14][21] 孙沛睿; 丁小浩. 大学生课外参与与投入的适度性研究. 大学教育科学 2010(6): 53-61.
- [2] 陈莉. 中国大学生组织发展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1-20.
- [3] 王占军. 高校学生社团运作及功能研究述评[J]. 江苏高教, 2006(05).
- [5] 鲍威. 未完成的转型——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8(1): 27-44
- [6] 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 The Tomorrow's Higher Education.
- [7] Harper, S.R. & Quayle, S.J. (2009).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diverse popu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8][12] 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9] Kuh, G. (2001). Asse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nside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hange*, May/June, 10-18.
- [10][11] 朱红. 高校学生参与度及其成长的影响机制——2010年首都大学生发展数据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6): 35-43.
- [13] Zhu, H. & Arnold, K. (2010). How Multi-variables Impact Student Achievement in Chinese Colleges? Presented at the 2010 Annual Conference for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on November 17-20, 2010, Indianapolis, USA.
- [15] 鲍威. 扩招后中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分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30(1): 78-87.
- [16] 朱红, 文东茅, 许锐. 首都高校师生关系的生态学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1(2): 23-28.
- [17] 朱红. 个性化深度辅导与大学生发展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8(1), 45-62.
- [18] 许丽媛. 高校学生工作与学生心理健康[R]. 北京: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 2011.
- [19][22] 杨钊, 许申. 本专科学生能力发展的对比研究——基于“2008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10(5): 17-22.
- [20] 朱红, 文东茅. 首都高校学生工作特征的分类研究及对策——基于学生参与度的视角. 思想教育理论导刊, 2011(3): 101-104.
- [23] 夏建华, 华秀梅. 高校团学活动精英化倾向及其克服[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129-130.
- [24] 安宁. 论高校学生工作队非正式组织的有效利用[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0: 33-42.
- [25] 陈莉. 中国大学生组织发展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1-20.
- [26] 隗同强. 学生发展理论下的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0: 31-40.